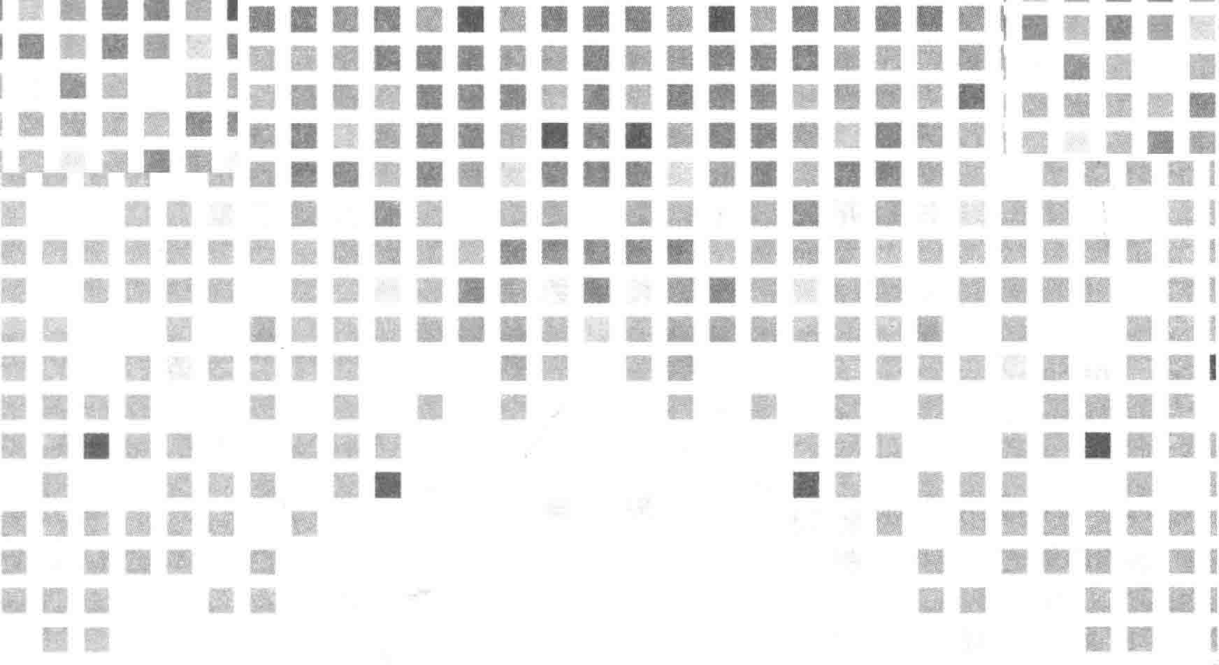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Power, Regimes and Regionalism*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权力、制度与地区主义

陈迎春◎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Power, Regimes and Regionalism*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权力、制度与地区主义

陈迎春◎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权力、制度与地区主义 / 陈迎春著.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7.8

ISBN 978-7-5192-3710-3

I. ①国… II. ①陈… III. ①国际货币体系—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8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4901号

书 名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权力、制度与地区主义
GUOJI HUOBI GUANXI DE ZHENGZHI JINGJIXUE
QUANLI ZHIDU YU DIQU ZHUYI

著 者 陈迎春

责任编辑 孔令钢

装帧设计 黑眼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60408

网 址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3710-3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简介

陈迎春，湖北谷城人，国际关系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南亚问题、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目 录

导论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001
第一章 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基本理论谱系	009
第一节 国家层次分析：以主权国家 / 政府为中心	009
第二节 全球层次分析：从功能性合作迈向全球主义治理	016
第三节 地区层次分析：货币空间的地缘经济整合	019
第二章 从地缘政治到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政治	025
第一节 从地缘政治到货币政治	025
第二节 国际货币关系竞争与合作的三大关键领域	042
第三节 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政治后果	050
第四节 国际货币关系的经济后果	057
第三章 货币权力与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霸权模式	069
第一节 货币权力与货币霸权的概念	069
第二节 货币权力的层次	073
第三节 货币霸权的主要作用方式	078
第四节 货币霸权的运行特点	085



第四章 国际货币制度与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全球主义模式	089
第一节 国际货币制度的含义	089
第二节 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治理机制的起源	092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国际货币关系的治理	100
第四节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制度重构	114
第五章 地区主义与国际货币关系的区域模式	116
第一节 货币地区主义与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变化	116
第二节 货币地区主义的欧洲模式	120
第三节 货币地区主义的非洲模式	135
第四节 探索中的东亚模式	146
第五节 其他地区的货币地区主义	157
第六章 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168
第一节 “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际货币关系治理模式的三大困境	168
第二节 当前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突出特征	177
第三节 “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若干构想	182
后 记	189

导论 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一、国际货币关系为什么需要治理

货币是经济的核心要素。在经济学意义上，货币具有三种职能，即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备手段。货币不仅关系到个体生命的荣辱，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有学者认为，“人类对货币的偏爱，其实有一种原始的驱动以及集体无意识，其中尤以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为最。这种偏好到了现代社会，即使隐蔽，仍旧存在，比如表现为对金本位或实物货币的非理性狂热”^[1]。

在国际关系领域，货币的发行、汇率以及流通范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和市场交易行为，也就是说究其实质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由市场决定的问题，而是由政治权力特别是大国霸权起着重大作用的动态扩展过程，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货币权力对国际关系的政治意义突出。美国金融史学家格列柯指出，“货币已经成为主权国家实行集权、聚敛财富和颠覆公民政府的政治工具。尽管已有‘无现金社会’的说法，这些说法并不意味着货币的终结，反而表明通过一贯有效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控制工具的运用，‘政治货币’得到了加强”^[2]。货币的影响力也可以转变为政治权力。政治化的货币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为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增添了新的内涵，也改变了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学者康纳指出，“传统地图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国家视为统一整体，将政治地理和主权权威混为一谈，仿

[1] 徐瑾：《白银帝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第 42 页。

[2] [美]托马斯·H·格列柯：《货币的终结》，周琴、刘坤译，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佛存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必然能控制一切”^[1]。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除了一些强势货币比如美元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越了传统主权国家的疆界，各个主权国家货币极力拓展的地缘经济空间也正在越来越有力地塑造世界的经济版图。因此，需要对国际货币关系进行有效的治理，防止其重演 20 世纪 20 年代货币集团纷起的危险局面。

不难看出，货币不再仅仅是国内政治工具，更是国家的国际政策工具甚至是外交“利器”，因而它正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根本性因素之一，更是我们理解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大国国际经济战略以及国际秩序变迁的一条主线，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究其要义，现有国际货币关系的治理模式或者路径，是基于国家权力上的霸权主义、基于国际制度的全球主义和基于区域的地区主义等三种模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幅复杂的动态图景。这三种模式分别代表着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不同的既有模式，忽略任何一个，都无法对国际货币政治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

二、从货币到货币权力：国家间财富分配的政治

在本原层面上，货币是一种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备手段。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货币则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权力，而货币霸权则是政治权力发展和演变的高级阶段。如果从权力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热衷于追逐货币权力，而其中那些综合经济实力强、军事和国际动员能力远超其他国家的大国才可以取得货币霸权。正如有国外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的历史上，货币无与伦比，它一直是人们热烈关注的焦点，引发了不计其数的道德与宗教非难，导致个人或国家之间经久不息的暴力冲突与竞争”^[2]。从权力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国际关系，就不难理解大国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国家为何要追逐货币权力。

当前的国际货币关系更加复杂，各国围绕货币而开展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也日趋频繁，金融外交日益受到政治决策者的重视，甚至超越军事安全而成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高阶政治”，攸关国脉与民瘼。具体来看，所谓国际货币关系，指的是一系列特定的安排和行为，而这些行为能够影响国家发行的国民货币的价值、使用、

[1] [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集团发行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9 页。

[2] [英]凯瑟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钱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 页。

稳定以及其他属性。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可以通过操控货币关系比如汇率，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偏好和政策选择。比如，金融学家古德哈特就认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做后盾，军事力量则是政治主权最直接的体现方式。^[1] 一个著名的例证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美国利用英镑的弱势，迫使英国立即停火并从埃及撤军，^[2] 同时，美国也借机阻止英镑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3] 在中国，明清时期向全世界出口茶叶、丝绸等高附加值的产品，换取了大量的白银，导致英国不得不以鸦片来支付巨额的茶叶贸易。但是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造成致命打击。为了获取更多的白银供应，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不得不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导致中国白银持续外流，导致清政府的白银储备从1793年的七千万两减少到1820年的一千万两。因此，鸦片战争其实是白银战争，与其说是为了鸦片，倒不如说是为了白银。^[4] 几乎与清帝国衰落同步的是，由于英国通过确立金本位制，英镑成为国际贸易结算的硬通货，被各国争相接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货币”。英镑的霸权货币地位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历经100年左右。

这些都是古今中外利用货币实现政治战略目的的典型例子，当然国际关系史上类似的其他案例还有很多。可见，货币以及货币权力在过政治中有着巨大而又独特的作用，甚至可以认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以货币和金融为中心的斗争与合作史。货币与权力的高度结合，早已成为推动世界大势的隐形力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大国当然也包括一些中等大国追逐货币权力甚至货币霸权。

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对货币空间的争夺正在超越地理空间的物理局限而成为大国整合势力范围的新方略。在经典的地理政治学理论中，地缘学说是世界秩序不可更改的基础理论，所有人类活动的最终逻辑都归结为：对领土的控制至高

[1] 转引自伍聪、赵然：《政治如何在货币国际化中发挥作用？》，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6期，第178页。

[2] [美] 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3] David M. Andrew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

[4] 周宁：《茶与鸦片：污染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毒品根源》，转引自杜君立：《现代的历程》，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78页。

无上。^[1]但货币的力量正在改变地理决定论的运行机理，而货币的影响力范围则成为大国追求货币权力的战略目标。一个佐证是，根据《政治地理学》杂志2005—2015年发表论文的议题分布，国际学术界对边境与边界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而对社会和文化的关注度总体上在上升。^[2]

因此，即便是一个粗通现代货币史的观察者，也可以注意到货币与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经验性的关系。^[3]比如，很多国际体系中的中小国家之所以支持美元，除了经济利益的考虑之外，一个关键性原因是它们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安全，也就是美国能够为自己提供安全保护，比如，冷战时期联邦德国支持美元，主要是为了抵御来自苏联集团的安全威胁；日本支持美元，则是为了换取美元在安全上的保护，这就为日美安全同盟加上了一道“再保险”；中东产油国愿意出口石油换取美元，并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也不外乎是为了确保本地区地缘政治的安全。然而，长期以来，对国际货币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的领域，政治学家很少专门涉及。经济学关注的是效率，排斥权力，认为权力会通过保护主义的手段损害市场资源的自由配置，而政治学、社会学则关注权力分配及其社会性效应。人们通常认为，与国际贸易、债务或者对外投资不同，汇率及其相关的对外货币政策技术性太强，与大众的公共利益或特别利益相隔太远，无法引起政治学家的兴趣。^[4]事实上，经济学家比如蒙代尔、金德尔伯格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蒙代尔就曾经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取决于成员国的权力格局”^[5]。

三、超主权模式以及迈向新全球主义的可能性

二战后战胜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关系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货币关系的全球性治理框架，奠定了今天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轮廓。该框

[1] [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集团发行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5页。

[2] 安宁、钱俊希、陈晓亮、朱竑：《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对《Political Geography》杂志2005—2015年载文的分析》，载《地理学报》2016年第2期，第219页。

[3] Kathleen R.M Cnamara, "a rivalry in the making? the Euro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441.

[4] J. Lawrence Broz and Jeffrey A.Frie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Annu. Rev. Polit. Sci.*, No. 4, 2001, p. 317.

[5] [加]蒙代尔：《国际货币体系：过去、现在和将来》，向松祚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架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根源在于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也是美国金融的结构性权力走向衰落的标志。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和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货币事务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占据了十分突出的位置，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题是：美元升值 50% 及其激发的国内与国际政治震荡，背负巨额债务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崩溃，以及关于欧洲固定汇率的争议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关系在实践中变得非常突出，其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因此学术界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其中，关于汇率政策的争论之所以成为研究的重心所在，其背景是国际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即关于创建欧洲单一货币体系的讨论，以及 1994—1998 年席卷亚洲、拉美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主题是：各国政府关于汇率政策选择，汇率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区域层次与全球层次上的汇率制度的兴起和发展。^[1]

货币日益成为一种全球公域，尽管它本质上仍然属于威斯特伐利亚语境下的内政。货币的国际化 and 全球化，以及各国为争夺货币权力而展开的博弈，客观上需要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治理。当前，虽然全球治理（比如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但仍然被这个时代的精英奉为圭臬，^[2]而全球性和区域性货币制度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在国际关系的层次上，货币已经融入到国际合作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可以利用它们来解释过去两个世纪里国际货币体系的兴起与衰落。因此货币与金融合作也是推动国际协调、催生现代国际制度的重要途径。从制度层面对国际货币关系予以规制，这是现代主权国家的行为逻辑，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在一个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基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在面临重大危机时，难以有效地起到预期的作用。国际货币关系的治理能否走向全球宪政主义模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能够为当前的全球金融秩序困境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1] J. Lawrence Broz and Jeffrey A. Frie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Annu. Rev. Polit. Sci.*, No. 4, 2001, p. 317.

[2] Dani Rodrik, "the false economic promise of global governanc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governance-false-economic-promise-by-dani-rodrik-2016-08>.



四、货币地区主义的可行性及其限度

货币是促进地区合作、培育地区认同和加深区域经济治理的重要媒介。如同语言和文字那样，货币也能够创造一种共同体的认同感。表面上看，地区主义是与全球化相悖的，但实际上全球化与地区化是同时进行但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进程，也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动态化过程。加拿大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指出，地区主义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开放性，并且一直支持而非威胁全球多边主义体制，因此不能把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当作预示世界秩序碎片化的竞争集团的问题。^[1]

二战后，西欧国家再次启动地区一体化进程，迄今为止已经达到了十分成熟的一体化水平，主要标志是成功地发行了地区统一货币，即欧元，其他地区比如东亚、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紧密跟进，比如 22 个阿拉伯国家在 1976 年成立了阿拉伯基金组织（AMF），这种态势形成了英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彼得·卡赞斯坦所谓的“由地区构成的世界”。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地区化进程中，货币一体化或者货币同盟是促进区域认同的必经阶段，也是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方式。比如，欧元区内部对欧洲的认同感要明显高于非欧元区。货币地区主义的出现，“既打破了全球层次上的治理机构的垄断地位，也可以实现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即解决好货币债务的错配问题”^[2]。由于受到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各个地区的货币合作与治理进程出现了不同的模式，比如欧洲地区是弱宪政主义模式，非洲地区是后殖民主义模式，东亚地区属于功能主义模式，而海合会框架内的货币合作则是极其独特的伊斯兰模式等。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各个地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是趋同还是差异性进一步放大，都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当然，目前货币地区主义进程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一些挑战因素是致命性的，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新兴的货币地区主义走向夭折。正如阿米塔·阿查亚指出，地区主义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3] 比如，2008 年以来美国的债务危机传导到欧元

[1]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4 页。

[2] Raj M. Desai, "global governa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case for regional fund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3, 2011, p. 115.

[3]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1 页。

区,对欧元造成重创。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包袱,只有终止欧元,才能拯救欧盟。东亚地区的货币地区主义也停留在初级阶段上,过去十年来出台的货币合作措施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离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同盟尚有巨大的差距。因此东亚此区域的一些一体化进程在货币合作方面进展缓慢,比如东盟经济共同体迄今为止并没有把单一货币纳入议程,美元化或者半美元化的色彩依然浓厚。

总的来看,世界各个地区的货币地区主义正处于多层、多进程同时推进的阶段,主要特征是货币合作有进有退,有快有慢,有的地区取得了成功,也有的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有的则停留在构想阶段。如果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地区主义之所以会停滞甚至倒退,主要原因一般是区域内主导力量缺失、区域认同不足、外部力量的干扰、地缘政治纷争等阻碍因素难以克服。不过,总的趋势是朝着地区融合的方向迈进,因为实践证明货币区域化可以大幅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区域认同、提高区域治理水平等。

五、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以上从国家层面的权力(特别是国家政策中关于霸权主义的取向)、全球层面的国际制度(全球主义取向)和地区层面的治理(地区主义的取向)所进行的实践,简述了货币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以及货币在这三个层面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机理,基本上廓清了既有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总的来看,在资本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货币关系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无疑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考起点。关于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不能够解释一些重大的国际政治现象,但它的确是我们认识这个日益全球化世界的一扇窗口。

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1]体现的是主导货币或者霸权货币背后的经济实力与政府信用。展望未来,货币外交将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领域,而关于货币空间的博弈也必将成为体现一国综合实力与战略素养的新疆域。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复杂化以及各国相互依存的加深,现有的理论模式不断显示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正如19世纪英国议员曾经不无唏嘘地指出,“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2]。大致

[1] Guido Montani, "Money and Finance as Global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to a Supranational Macroeconomic Theory," *SAGE Open*, No. 1, 2011, p. 1.

[2] 转引自徐瑾:《白银帝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42页。

来看，当前关于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着以下几个挑战。

第一，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如何实现互相促进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澄清逻辑分析框架，努力消除现有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存在的模糊性特征。比如，关于国际政治权力对国际货币关系和治理的影响方式，需要加以系统研究。由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许多研究人员对政治因素对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货币立场及其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很少有文献以一种可测量的方式对此进行研究，也就是普遍缺乏定量分析。^[1]实际上正是国家间权势的失衡变化影响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选择。比如，20世纪初期，美元国际地位的崛起与一战的爆发相一致，导致国际政治权力转向了美国。^[2]此外，当前以新兴经济体开启的货币权力转移进程，对国际货币治理秩序产生什么的影响，都值得研究。

第二，国际环境对一国的汇率政策选择产生什么的影响问题，就是说需要把汇率政策的国内和国际来源及其影响整合为一体，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根据帕特南的“双重博弈理论”，国家政策往往是国内因素和国际体系双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在现代国际货币关系中，汇率政策的变动也是国内决策者、利益团体和国际货币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汇率政策的分析，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不同权重和影响。

第三，结合当前国际贸易规则的新变化，需要进一步密切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比如“E”国际贸易和金融政策对国际货币事务的影响，并把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加以通盘考虑，从而为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领域和框架打好基础，正如戴维·安德鲁斯（David Andrews）所期待的那样，国际货币关系的研究，需要构建一个结构性的理论框架。^[3]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课题，而把作为国际关系格局基本动力之一的货币作为研究对象，则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需要借助国际政治、国际金融史等领域的专业“工具箱”。上述这些问题对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1] J. Lawrence Broz and Jeffrey A. Frie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Annu. Rev. Polit. Sci.*, No. 4, 2001, p. 318.

[2] Hyung-Kyu Chey,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monetar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12, 2012, p. 71-72.

[3] David M. Andrews,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te autonomy: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2, 1994, pp. 193-218.

第一章 国际货币关系治理的基本理论谱系

第一节 国家层次分析：以主权国家 / 政府为中心

一、现实主义的权力视角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源远流长，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流派之一。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各大分支（主要分为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均认为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国家追求权力和自我利益的过程和结果，不同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绝对权力，而新现实主义关注的则是权力结构。

由于现实主义高度关注权力因素，认为权力是国家考虑货币合作与制度安排的最主要因素。这种理论进而认为，货币地区主义是霸权国家的野心和利益的副产品，^[1]而货币地区主义则是权力主导下的货币合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最大化。大量的事实都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还是区域层面上的国际货币秩序，都体现为一种国际政治安排，而不是市场力量自发的产物。^[2]比如，云科尔认为，在各个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不会逆转的货

[1] Scott Cooper, "Third World Monetary Blocs: Small State Choice or Great Power Hegemony?" *EUI Working Papers*, No. 2004/30, p. 1.

[2] 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主导》，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24页。

币联盟，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把它嵌入在一个政治联盟之中。在这样一个政治联盟中，各成员国在货币领域之外的其他权力也必须转移到某个超国家机构之上”^[1]。其他学者同样比较重视权力因素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的地位。比如，“明茨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有时候被认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最重要条件。蒙代尔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科恩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了主权国家的权力安排”^[2]。科恩还认为，霸权国的存在，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而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倾向于依赖于霸权国为提高国际货币的安全性而提供的保证。^[3]总的来看，在现实主义论者那里，尽管单一货币很重要，但它作为促进区域内贸易、统一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方式，应该成为实现更重要的权力诉求的基石。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对权力进行了深刻而又全面的理解，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比如卡尔）对于理解欧洲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4]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层次密切相关。绝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把欧洲一体化（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主义）视为国家特定的权力在国际体系的层次上进行分配的结果。有学者从现实主义前提出发，认为国家权力的分配主要是集中在地区层次，而非全球层次。甚至还有学者推测，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欧洲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从而改变国际政治中的单极体系。^[5]

比如，在欧洲一体化的领导权问题上，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欧洲一体化至少部分地依赖霸权的主导。霸权提供军事和政治资源，以创造秩序和维持势力范围的秩序。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欧洲一体化中的法德领导地位构成了一种“合作性的霸

[1] 转引自[美]约翰·冯·奥弗特韦尔德：《欧元的终结？》，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2] 转引自陈文奇：《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障碍及中国的对策》，载《特区经济》2006年6月号，第19页。

[3]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

[4] Daniel Kenealy and Konstantinos Kostagiannis, "Realist Visions of European Union: E.H. Carr and Integration,"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1, No.2, 2013, pp. 221-246.

[5] Anders Wivel, "The Power Politics of Peace: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a Realist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9, No. 5, 2004, p. 10.

权”，而德国仅仅是在金融领域构成霸权。^[1]从这一点来看，欧洲货币体系（EMU）是否就是欧洲各国政府间进行大量的交易的结果？各国参加 EMU，是否是为了提升经济效率和物质上的繁荣，或者是为了其他的政治目的？^[2]研究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学者通常会驳斥这样一个观点，即德国是一个地区性的霸权国（regional hegemonic power）。然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及其成员国对它的坚持，可以解释为这些欧洲大陆国家携手共同应对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造成的不稳定问题。换言之，跨大西洋关系越糟糕，欧洲货币体系就越具有持续性。同样地，欧洲货币联盟也可以理解为赢得某些地区霸权而付出的努力，或者至少可以视为汇聚主权、增加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尝试。^[3]总的来看，权力是现实主义观察欧洲货币一体化现象的重要视角，对相关国家政府的决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二、国家利益偏好理论

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充斥在媒体、学界、政府等话语体系中。但是，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偏好？不同的国家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中国著名学者王逸舟教授对此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国家利益的界定，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中，既有给定的、不会改变的内容，也有不断变化的内涵，后者又分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4]从王逸舟教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利益的偏好与选择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而非一个刻板的模式。乔治和基欧汉则对三种国家利益进行了分类：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即所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亚历山大·温特则加上了第四种利益，即集体自尊。他特别指出，如

[1] Anders Wivel, "The Power Politics of Peace: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a Realist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9, No. 5, 2004, p. 11.

[2] Tal Sadeh and Amy Verdun, "Explaining Europe's Monetary Union: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11, 2009, p. 286.

[3] Tal Sadeh and Amy Verdun, "Explaining Europe's Monetary Union: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11, 2009, p. 293.

[4]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